

欢迎您阅读北方文艺出版社电子图书



摇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摇摇摇地摇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房屋
号)

摇摇摇邮政编码: 518000

摇摇网摇址: www.yaoyaowang.com

摇摇摇电子信箱: zyy@163.com

黑版贸审字 园愿—园用园—园用园号

④精微思遣云籍分援刃自崇魁机牙庭劫署蛋贼察议上匪替份藏察译集粤言集翻播

④用园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摇摇不得翻印

成长的准备

Chengzhang de Zhunbei

——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的危害

作摇摇者 辕美)凯·海莫威茨

译摇摇者 辕李静滢

责任编辑 辕李金慧

封面设计 辕安摇璐摇张摇骏

出版发行 辕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摇摇址 辕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园缘号楼

邮摇摇编 辕员缘园园

经摇摇销 辕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 辕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摇摇本 辕缘园伊园愿自摇摇员缘园

印摇摇张 辕苑圆缘

插摇摇页 辕园

字摇摇数 辕员猿千

版摇摇次 辕圆园园年 员月第 员版

印摇摇次 辕圆园园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辕员—远园园

定摇摇价 辕园圆园元

书摇摇号 辕陈年苑陈毅翻题题题题 员凌苑

目摇摇录

导摇言摇空巢	员
第一章摇自然推断	员
第二章摇天才婴儿	圆
第三章摇反文化教育	缘
第四章摇豆蔻年华	愿
第五章摇十四岁的成年人	员
第六章摇性与反文化的青少年 ...	员
第七章摇后现代与后青春期	员
结摇论摇归巢	圆

导言 空巢

“**20世纪**将是孩子的世纪！”**19世纪**初，儿童活动家爱伦·凯满怀希望地这样预言。她并非盲目乐观。美国人一向关注青少年问题，激进的改革者们也开始探寻孩子的世界。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取缔童工，确保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为少年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以保护行为出格的青少年罪犯，使其免受过于严厉的惩罚，也不必进入成人的监狱。与此类似的乐观情绪在与爱伦·凯同时代的美国人中并不少见。

然而，**20世纪**即将落下帷幕时，人们的希望却化为泡影，留下的只是难言的辛酸——**20世纪**里，人们发现了孩子的世界，结果却又眼看着它无法把握而消逝……

过去三十年间孩子的外表着装和所作所为变化极大，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些变化和一些最突出的、使我们最伤脑筋的社会问题紧紧相连。

以往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根本不会和孩子联系在一起，而如今形形色色的少年犯罪现象越来越多，以至一些法律专家主张取消少年法庭，把少年罪犯送交成人法庭审判。

犯罪行为也不再限于家境贫穷或年纪略长的青少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八岁儿童仅仅因为同学‘嘲笑他耳朵的样子’就向他开枪。案件发生后,该城只好将搜查枪支的措施扩展到小学校园。1989年11月,在克罗拉多州的利特尔顿,两个来自双亲家庭、家境富裕的少年持枪打死了他们的一名老师和十二名同学。血案发生后,美国人震惊了。

性原本被认为是成年人的事情,然而青少年性行为已成为普遍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未婚父母、私生儿、堕胎现象的剧增,给社会福利带来了很大压力。尽管近年来发生过性行为的青少年百分比有所下降,但性行为的发生年龄却提前了。专家们说,十二岁孩子间性行为的复杂程度使他们吃惊。1988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学校开始给五年级学生发放避孕套。据《纽约时报》健康专栏撰稿人简·布劳狄报道,专家相信,女孩子九岁时父母就应该教导她们“何时向男人说‘不’,怎样说‘不’”。九岁,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对此都会感到不可思议。

孩童时代的消逝也体现在儿童日常的生活节奏中。幼儿现在可以使用配有教育程序的‘膝上电脑’,在幼儿健身房中锻炼。三岁儿童组成足球队或七岁儿童戴上护肩头盔组成橄榄球队已不算什么新闻。实际上很多孩子上小学起就已上了快车道。一些教育者认为休息是‘浪费时间’,连一年级小学生的作业负担也大大增加。

现在的孩子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讲述前一天晚上电视节目中的笑话。他们在课堂上情绪烦躁,直打瞌睡,表明他们晚上肯定看电视。大众媒介

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信息来源。孩子们在幼儿园和学校会学到有关大屠杀和爱滋病的知识。市场营销专家费斯·波普克恩推测说：下一世纪，我们将看到孩子健身俱乐部出现，孩子成为因特网专家，还会有新兴的行业，为孩子提供专业化的职业设计。

过去十年间孩子最显著的变化或许发生在八至十二岁之间的儿童身上。美国儿童电视网世界研究企划部副总裁布鲁斯·弗兰德在报告中说，过去十年里，十至十二岁孩子的穿着行为像从前十二至十四岁的人。十一岁时聚在一起的孩子就说他们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未成年人了。十二岁孩子的自我评价竟是“轻佻、新潮、性感、冷漠”。化妆品业和时装业为不再天真的十岁孩子设计生产各种唇膏、染发剂、人体彩绘颜料，以及以“香草园”、“跟我来，男孩”一类名字作商标的香型彩妆。相比之下，玩具业的发展就差多了。玩具业的上一代服务对象是刚出生的婴儿到十四岁的少年，这个年龄段已经从十四岁缩减到十岁。

我们当代的社会环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竟然使孩子成了危险人群呢？

心理学家大卫·艾尔坎特认为，竞争加剧的社会中父母承受巨大压力，个人愿望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子女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是“焦躁的儿童”。玛莉·文以 70 年代离婚和家庭破裂情况的急剧增加为例，认为孩子们“失去童年”是因为现在社会“不再有秘密”，父母已不再保护孩子，使他们过早地受成人世界、尤其是有关性的信息影响。社会批评家内尔·普斯特曼同意玛莉·文的部分观

点,认为“不再有秘密”是孩子“失去童年”的主要原因,但罪魁祸首是电视。普斯特曼认为电视是信息的主要媒介,父母有权管教孩子,正如政治家有权决定他的观点。读写能力是获取知识、信息的先决条件时,孩子无法知道他不该知道的事情。但电视是“全无遮掩的媒体”,它使孩子得知对他们本是禁忌的事情,从而使他们和成人一样面对世界。

传统家庭结构的衰退、功利社会的要求、媒介性刺激、暴力行为方面的信息越来越多……本书承认这些社会现实对儿童的冲击,同时指出造成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孩子“失去童年”很大程度上是成人自觉影响的结果。对此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

我们身边有很多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教育者、儿童活动家、立法者、广告商、市场商人、出版故事书和电视节目讲故事的人,这些人无不影响着我们对孩子的理解,而孩子的现状和他们的观点、行为有直接联系。当然,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会公开主张取消“童年”的概念,他们所做的十分微妙。他们推进人们对孩子的认识,说孩子是有能力、有理智、有自主性的,孩子具备进入成人世界所必需的一切品质——才智、兴趣、美德、良心和自我意识。按照这种观点,孩子无须成人过多的改变,他们已经大体“成型”。传统观念中的童年是一个转变阶段,这期间孩子从尚待塑造成长为有文化、能胜任挑战的人。而现在童年失去了它的意义。

美国人认为孩子已经大体成型的观点违反直觉。难道我们不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担心孩子在贫苦中长大呢?是,也不完全是。美国人的

确认为孩子成长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像食物和家，爱和鼓励。他们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孩子就会在学校表现不佳，吸毒、怀孕，甚至犯罪。他们不再相信、不再提及的是，孩子必须由长辈引导走入业已存在的社会，走入意义之网——简言之就是进入一个文化体系。相反，孩子需要自己创造他们的世界。

帕提西亚·赫什的《独特的群体》一书记录了弗吉尼亚高中生的生活。书中写道：“从微积分到人生的意义，一切都需要辩争。”当代美国的文化部门把青少年描写成孤独自主的旁观者，完全用自己的方式来审察判断世界。成人在孩子寂寞孤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已降到个人指导甚至只是随从的地位。他们或许可以教孩子一些技能，使孩子们了解一些本不熟悉的信息，但无法使孩子们走入社会，也无法赋予这些信息意义与价值。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孩子力量，增加孩子的自信，满怀爱心地守候孩子的自我，看它有一天能够超越躯体的外壳放出异彩。

有人认为孩子的成长不应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甚至应和文化相对立，我称这种观点为“反文化主义”，它是美国儿童问题的根源。反文化主义是儿童专家的重要观念，并且已渗透到法庭和学校，渗透到杂志出版业和电影界，渗透到我们的厨房、居室和游戏室。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抽象名词。反文化主义的时代培养了一种新的美国人格，对此我们应深入思考。

一种有关道德发展的主导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反文化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多数文化体系中都有一条公认的真

理,那就是成人应教给孩子道德准则,要求他们抑制反社会的冲动,从而使孩子成为文明社会的成员。但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道德发展学家凯洛·吉里根却认为,道德问题出在成人身上,孩子们没有任何问题。她在研究克利夫兰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后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她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认为青春期前的女孩子比成年女子品行更好。她们“真诚”,她说,她们“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谈出对性关系的想法和感觉”。这种率真是“智慧和大气”的表现,来自“构成品行智慧的核心”的洞察力。当成人干涉这种天赋的才能时孩子才会出问题。

一些人可能觉得学校里的女孩子排他、残忍,吉里根却相信她的研究对象经历的文明化进程不是太浅而是太深。这些女孩子成熟以后,她们与生俱来的品行就会被“来自外界的成人的声音”淹没,被“父母和老师的要求”掩盖。完成作业、排队、和同学分享等要求只会造成她们“心理上的束缚”。曾经是诚实、充满活力的女孩子失去了自然真实的“声音”,屈从于怀疑、自我否认和“沉默”。反文化者相信的一个神话就是这样:孩子生来有道德律,成人想使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反而毁了他们。

孩子需要成人真正的教导帮助。一些新出版的书籍自称会更现实地考虑这种需要,实际上却被反文化思潮的论调主导。

罗伯特·科尔的畅销书《儿童的品行智慧》开篇时似乎尽力避免落入反文化的桎梏。作者说,父母和老师并未给儿童提供足够的行为指导。但该书的结论是,孩子不仅

有行为规范,而且有足够的品行智慧。这一结论有悖于他对少年性格发展的阐述。他把孩子对世界的体察看成了禅宗祖师的体悟。谈到他和孩子们进行的课堂讨论时,他说,他们“静静地坐着”;“反应敏捷”;“有灵活的行为规范”。科尔在许多电视采访中重复讲述的一则逸事表现出他九岁儿子的理智。当时他飞车将受伤的儿子送往医院,儿子却叫他慢一点儿,小心不要出事故。“儿子成了我行为准则的导师”,科尔感叹道。的确,在反文化的美国,孩子经常被看作成人的导师。

吉里根和科尔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控制行为的能力,像这样的想法倒也有些道理。毕竟,没有对群体感与群体和谐的自然趋向,我们就不可能发展文明社会。但同样有道理的是,从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人性也有阴暗的一面,更不必提孩子是如何对待他们兄妹的。直到 20 世纪中期,一个公认的明显事实是,孩子倾向于暴力、侵犯,以自我为中心,而长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抑制并重新指引这些冲动。而弗洛伊德,尽管观点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还是在儿童的罪过栏里加上了性反常和弑父情结。

在报纸的新闻头条里,在学校的操场上,人们总可以发现人性阴暗面存在的充足证据;但在美国专家的论述中这种证据却非常少见。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森查阅了有关道德准则发展的书籍,惊奇地发现没有一本提到“自我抑制”。

实际上这种惊奇没有必要。在专家眼中,美国儿童没有需要抑制的冲动。孩子的本性被纯洁化了,“冲动”一词

已从专家的记录里消失 ;而‘ 本能 ’,原本会唤醒人身上的动物性,被转指为‘ 语言本能 ’一类的建设性动力。我们通常把攻击性和野兽的习性联系到一起,但社会生物学家们在动物身上寻找人类行为的远祖根源时,更倾向于探寻利他互助的倾向,而非这种进攻性。

社会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说,18世纪的教育手册显示出,人们担忧的是孩子们对动物的残忍 ;而到 19世纪中期,专家们更为担忧的是孩子对动物的惧怕心理。安妮·麦克劳德对比了 18世纪和 19世纪晚期的儿童文学,发现了类似的变化。18世纪的书中会写到经常犯错或表现得残忍的儿童,这些书向儿童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危害。但是到 19世纪中期,年少的主人公看上去没有什么要学,也从不需要受责罚。例如,朱迪·布卢姆的流行小说就刻画了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们的生活里‘ 没有评语,当然也不存在责难 ’。

做父母的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来反对这种阳光灿烂式的思想,但他们对待子女时似乎也感染上了专家的乐观情绪。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母亲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孩子性格中积极的方面是‘ 天生的、稳定的 ’,而相对消极的方面则是‘ 暂时的、外界造成的 ’。当今的父母面对自己孩子犯错的证据时,总是坚持说 :‘ 肯定搞错了,那不会是我的孩子,一定是别人家的。’这常使教育者们感到苦恼。

实际上美国人坚持认为(也希望如此),孩子们总体上有足够的智商与情商。19世纪中期,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成长的过程是缓慢展开的。太多的专家和父母问

他这一过程能否被加快，因此他将这一问题称作“美国疑问”。这个问题存留至今。三十年后，大卫·埃尔金德围绕“超级儿童”的神话，在全美进行讲演，想引起人们对儿童实际能力的关注，但人们不为所动。他发现，谈到儿童能力，美国人的想法根深蒂固。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儿童本性纯真，而美国人对儿童本性的顽固的乐观主义不应和这种浪漫主义信条混为一谈。的确，这种浪漫主义遗产在美国文化中呈现了生命力。科尔斯和乔纳森·科佐尔等作家常追溯这一传统的鼎盛时期。“这不是上帝的国度，”在科佐尔的书中，十二岁的基督式男孩指着荒凉的纽约南布朗克斯贫民区说：“上帝的王国是充满荣光之地，这里却是苦难的家园。”在科尔斯笔下，一个不幸患上白血病的十岁男孩“眼里闪着光芒”，仍然为他的医生和护士做祷告。政治家们也倾向于将儿童看成布莱克笔下的社会人物，抗议自私和无道德的时代。

然而，当代能干自立的儿童与其说是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不如说是浸染于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科技中的一代。电脑时代的孩子与其说是纯真无邪，不如说是有能力、守规矩。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关于幼年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足以说明这点。

多年来世界心理学中占主导的是行为主义者，他们认为幼儿的大脑如同一块白板，父母可以随意在上面勾画。20世纪70年代晚期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家则不同，他们认为幼儿的大脑始终占优势，幼儿具有神奇的创建性。

年的一期《新闻周刊》中写道：“幼儿是学习机器。”孩子不间断地主动学习，没有情感的困扰和不理智的需求，他们只需要外界输入信息。因此仅仅几年时间，他们的举止就可以表现出天赋的行为准则，这也不足为奇。

商业市场将复杂世故列入孩子的天分中，使有能力的孩子形象变得充实。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仿佛全知全能的孩子形象常出现在荧屏上和精装杂志的封面上。经常出现在这些孩子周围的则是束手无策的成人（多数是男人）。1989年《时代》杂志上有一幅广告，画着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中年人愁容满面，少年则是一派‘想不到他会这么蠢’的表情。边上写着：“现在，当父亲说，‘儿子，该是简单谈谈性知识的时候了。’他可能这样回答：‘好啊，爸爸，你想知道什么？’”

媒体至少从 20 年代起就开始偏重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而电视一直促使孩子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人，没有多少向长辈学的。特别是过去二十五年里，大批妇女参加工作，离婚率上升，“小鬼当家”式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需要给自己买东西，需要做更多的家庭采购。这种复杂的儿童形象成了主流。一位媒介观察员说，娇弱做作的孩子形象“现在已经过时了”。

孩子拥有更大的主动权，营销者对此并不反对，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尚待开发的市场。“给人权利，给孩子权利！”就面向孩子的广告问题，《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这样大声疾呼。

孩子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可以自己探索现实,这种想法是美国政治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个体有自主权、可以按我们想要的方式生活、自己思考判断、自己作出决定,这些构成美国人信仰的主体。事实上,“自我决定”是美国国家的主要原则。但是面对孩子问题,这神圣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如此珍视自我决定权,又怎能告诉别人如何思考如何做事?哪怕是告诉一个小孩子也不应该。“孩子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弱点”,一位法律专家评论道。

大多数父母迟早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孩子想去看一场电影或去朋友家,遭到父母反对时会大喊:“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这类话表示,孩子发现他的社会地位有些不对头,或感到有些不公平。这也让父母进退两难。罗伯特·贝拉等人合著的《心灵的习惯》一书中分析了 20 世纪晚期美国人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书中写道:“对高度个体化的美国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有些反常的东西,因为从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孩子对父母天生的倚赖不太正常。”

有了这种两难的思想,再加上美国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移民国家,人们重新考虑成人与孩子的关系,就会得出对传统思想不利的结论。

通常情况下孩子是陌生世界的新来者,父母充当他们经验丰富的向导,指引他们走入文化的神圣领地,使他们了解有关知识、民族的语言和情感、信仰和仪式。移民的情况却令人痛苦地颠倒过来:孩子很快学会所在国家的语言,了解其传统,而父母无法摆脱旧世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学习语言又比较慢,反倒要向孩子学习。土生土长的美国父母也

无法避免这种问题。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成人在运用熟悉的规则前难免犹豫，面对充满诱惑难以预测的未来他们也要向子女征求意见。

美国人认为孩子是自主的个体，能自己作出决定。可以说他们是在坚持自己的某种理想，但与此同时他们背离了其他举世公认的真理。即使在原始社会，人们也认为，孩子要成长了解社会文化要求的人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父母、亲戚以及所有长辈积极持续的指导干预。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伴随着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西方文明社会开始延长这个成长过程，加强对孩子的重视。孩子参加工作的年龄推后了。他们和成人世界分开，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怀。

这些西方观念在美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到 20 世纪初期，牧师、知识分子和其他文化界的代表在新国度的理想支配下，开始培养我称之为‘共和儿童’的新一代人。他们的中心目的是积极地帮助孩子支配自由。此前人们一直采取体罚的方法，但为培养自立的个人，这些人反对体罚，要求父母倾听孩子的心声，对他们讲道理。他们鼓励父母给孩子游戏的时间，鼓励中等人家把家里装满书和玩具，以此唤醒孩子朦胧的心智，激起他们的兴趣。但‘共和儿童’仍然需要人们的认真对待。父母必须教导孩子在个人抱负和公共利益、遵守法律和独立自主、服从上级和自我为尊之间寻求平衡。没有人认为这些极复杂矛盾的文化观可以自然转变。共和理论家认为这是艰巨的任务，困难程度可以和挖掘庞大、交错的多层地铁系统相提并论。要成功培养一

个孩子至少需要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需要母亲时刻不停的关怀，父亲经济和感情上的支持，以及整个社会的真正重视。

今天我们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培养‘共和儿童’所需要的家庭安排。这种安排是现代西方社会所特有的，而且通常需要父母作出牺牲。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共和传统的众多目标和方法，今天看来它们仍然有意义。尽管存在很多问题，‘共和儿童’还是建立在一些貌似矛盾的真理上。反文化主义忽略了这些道理：孩子必须由成人塑造成独立的个体，孩子并非天生知道怎样按自己的主见来生活；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竞争的企业对市民和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反文化主义氛围下，这些道理引发的成人意志心态大部分丧失了。这毫无疑问是现实问题。多数美国人只是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传统父母需要做的一切。经济压力已使许多妇女出外工作。20世纪70年代，将近30%的美国孩子的母亲总是在家，时时照顾他们。可是今天，享受这种照顾的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只有大约15%，学龄前儿童也只有10%。

大批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工作。不管家庭收入如何，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家庭生活的面貌改变了。心理学家肯尼思·格根说，家庭‘不再是安乐窝，而更像中途加油站’。帕特里夏·赫希这样描写弗吉尼亚雷斯頓的近郊生活：上午八点半，到处一片静寂，这是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的代表。纽约富裕的地区，一些孩子参加‘作业俱

乐部”，在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活动。白天上班的父母雇人在那儿照看小孩，帮他们做作业，监督他们拉提琴，有时还要给他们做饭。其他孩子则没这么幸运，估计大约有七百万孩子放学后生活在“自由天地”里。从 1960 年到 1980 年间，白人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减少了十小时，黑人父母则减少了十二小时。1985 年，劳伦斯·斯坦伯格调查了两万名十几岁少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校里冷漠的问题学生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父母不照管孩子。

父母照管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和工作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反文化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后面还要谈反文化思想）。面对公认有能力自己成长的孩子，父母——实际上是所有成人——都不清楚在和孩子的关系中自己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

简·雅各布斯在 1961 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谈到上一代人所认定的成人角色。“我一个儿子自己跑到街上，受到锁匠莱西先生的大声责备。我丈夫路过锁铺时莱西先生又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这样，我儿子得到的不只是有关安全和听话的教训，更主要的是，他间接地认识到，莱西先生也认为对他有责任，尽管我们只是街坊。”莱西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像阳光下的雪人一样，总会从世间消失。一项调查表明，犹豫的成人不愿在公共场合批评犯错的小孩，当孩子出麻烦时仅有犹豫的人愿意告诉邻居。

就连父母也显得不愿指导缺少经验的孩子。同一项调查认为，父母“对管教和威信感到没有把握”。科罗拉多州